

房氏族人为官靠“经营”



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联合报道



▲清河房氏太夫人墓碑及墓志铭拓片,其碑立于今济南历城西彩石村。(资料图)

◀房玄龄画像。(资料图)

在朝代更迭的中国中古时期,唯一不变的社会法则便是农耕、商贸和仕途之路。被称作大姓豪族的房氏家族内部制定了农商助仕,官宦反哺的家族生存法则,从汉末到唐中,这个家族社会中的农民、商贾和“公务员”都以各自的角色维系整个家族的生存,个体与集体的诉求在那时悄然统一。

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

一个几百,甚至上千人家族的主要收益来自家中在朝廷做官的俸禄,从西汉以降,这种“高薪养官”并不罕见,这不仅因为官员家庭可以在经济上有一定政策性收入,还会免除赋税。于是“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”,齐州房氏在北魏、东魏、北齐时期便一直致力于仕途,从房雅、房豹,乃至隋唐的房彦谦、房玄龄父子,房氏家族子弟始终居于高位,成为家族发展的重要保证。

“官俸较高,仕宦所得一直是房氏家族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。”山东大学教授周尚兵说。而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同,人们在选择职业时就形成了以“推择为吏”为先、以“治生商贾”为次、无可奈何之下才从农的社会心态。

不过,对于尚未在仕途上有所斩获的家族而言,发展经济,积累财富而入仕便成为家中的首要目标,甚至家族庄园经济的生产不是为了经商,而是赚钱入仕。

为何要赚钱入仕?周尚兵解释说,这并非当时的不正之

风,而是当时选官制度造成的。淮阴侯韩信“始为布衣时,贫,无行,不得推择为吏,又不能治生商贾”,遂为乡人所笑。

周尚兵考证,乡官在推择本乡人才为吏时,须要考察两个方面:一是家境富裕,二是修有善行。而财富还能换来对乡里的乐善好施,增加口碑。

换句话说,要在乡举里选的官员推荐制度中胜出,不仅需要才能,还需要一定的财富,即使在今天,这种方式依然在我国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层选举中奏效。

虽然无从考证房氏家族如何利用财富支持子弟入仕,但从房家一份《四民月令》家庭生产及交易活动时令表便可以看出,房家家族庄园涵盖大田生产、园圃种植、林木种植、饲养采集、蚕织和酿造,几乎全年都有种植和产出。这不仅成为家族子弟入仕的“敲门石”,同时还是官员“养廉”的基础。

房氏的庄园经济蔚为可观。他们在济南城的产业涉及饮食、宾馆、粮食加工、药材、娱乐、果林种植、粮食生产、畜

类养殖等多种行业,但这只是其家族产业的一小部分,在赵山之阳的乡村之家亦应当有大量田产,《隋书》云房彦谦“家有旧业,资产素殷”,当是指其城乡田产而言。

除了大力发展庄园经济,房氏不忘学以致用,一手好字也为他们赚了不少钱。房彦谦父子都“工草隶”,尤其房彦谦“又善草隶,人有得其尺牍者,皆宝玩之”。房氏既为著名书法家,题写匾额、墓志铭之类所得诸项润笔之资当是家庭经济的一大来源。在平齐郡时,房景伯仅靠书法技能就得以“闲书自给”,还能供养母亲及弟弟房景先等读书。

随着唐代推行科举制而引发了士族迁居中央、城市的迁徙潮流,齐州房氏后人亦莫能例外,房氏诸宗支大多迁离齐州以利科举干禄,房玄龄子孙都成为城市中的官僚集团,而乡里的家园只成为调养身心的临时住所。

不过从事举业依然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,这包括应举之前十年苦读的书籍文具及束脩费用、应考期间的旅行住

宿费用、考前行卷费用等等。齐州房氏后人为了科举,虽然离开旧有的庄园,但仍不忘重置产业,成为城居地主。而因为当时举业法令禁止工商之人干预仕途,房氏后人自然选择了能致富而不影响仕途,以庄园为主要内涵的“农”。

齐州房氏后人居城而从事举业的子弟,现所知有房承先、房习祖、房鲁、房逸、房兴昌等五人,他们在当时的洛阳置产业。于是,敦家学、谋科举、入城居、置庄田、营货殖,这是唐代齐州房氏后人的主要生活方式,也构成了房氏子弟“仕”与“农”交织的生活画卷。

而对于房氏后人,除了进朝做官的子弟可以通过家庭经济与政治资源参加科举,大部分房家后人则进而转为农民和商人,这也就是当时盛行的“不仕则农”。而“不仕则农”作为唐中期以后中国人治生选择的途径,不徒是齐州房氏,在随后的制度演进中还被固化成了山东几十个文化世家共同的“耕读传家”的文化传统。

家族解码

房氏当官以清白为目标

房彦谦一直遵循“清白”为官的原则,他曾从容教诲其子房玄龄说:“人皆因口福,我独以官贫。所遗子孙,在于清白耳。”房彦谦的兄长房彦珣“外持公正,内抚乡情,剖断谐其宽猛,言行尽其忠信。邦国不空,时誉俄远。释褐仪同开府行参军,寻除殿中侍御史。方直之操,以法措枉。仁恕之道,自己及物”。

房三益,字敬之,先仕于南朝,南阳被北魏攻克后依附于魏,“三益了了,殊不恶”,这是北魏孝文帝与房三益长谈之后的总体评价,其意为“三益很聪敏,相当不错”,房三益因此被拜为员外散骑侍郎,不久被派任命为太山太守,转任兖州左军府司马,“所在以清和著称”。房亮,“历济北、平原二郡太守,以清严称”。

其次,房氏居官行政以为民办实事为宗旨。房玄龄的叔祖房豹任乐陵太守时,“郡治瀕海,水味多卤苦,豹命凿一井,遂得甘泉,遐迹以为政化所致。豹罢归后,井味复咸”。房彦谦“以秩满,迁长葛令,甚有惠化,百姓号为慈父”。

房氏数代修国史

齐州房氏家学分两类:一是学术学识;二是应用技能。学术学识主要以史学、文学、经学为主。应用技能以书法、文艺为主。

齐州房氏史学以房景伯兄弟三人最为突出。“景伯性醇和,涉猎经史,诸弟宗之”。房景先“昼则樵苏,夜诵经史,自是精勤,遂大通赡”。房景远“好史传,不为章句”。房氏史学尤其房景先的史学才能得到当时学林同仁的认可,被举荐参与修撰国史。房景先之子房延祐,“虽夙涉朝位,并非史才”,但因为房氏家传史学的影响,房延祐仍得以列入《魏书》编撰人员之列。房氏史学传至房玄龄,“博览经史”,亦具有史学才能,唐太宗因此任命房玄龄领衔监修《晋书》,主持史馆工作。入唐以后修史工作是当时最为荣耀的三件事之一,有流行语述其事云:“年轻有为,进士出身,编修国史,娶四姓女”。高宗朝宰相薛元超就以不能参与编修国史而引为毕生之恨:“吾不才,富贵过份,然生平有三恨:始不以进士擢第,不得娶五姓女,不得修国史。”

中央集权导致房氏衰落

循着汉代“通经致仕”的制度安排,综合东武城的经济与人文基础,清河始祖房雅定居于清河郡东武城后,合齐学、鲁学于一炉,粹成房氏家学于清河郡。到东汉末期房植以经学知名,创下“天下规矩房伯武”的名号,隐然成为汉末党人的精神领袖,结门生义故于当时,家学、人物两旺,清河房氏的地域势力于焉大成,房氏步入士族行列。

迁居于齐州的房氏家学渊源,人物辈出,亦有着强大的地域势力。然地域势力自北齐以来,就遭到了皇室中央的压制。至隋朝,隋文帝以“中央化”策略对地域势力进行制度性拆解,又废除九品中正制度,为士族、豪族设计了新的仕进道路:科举、门荫并举。这两项制度为唐朝继承并加以完善,其中抑制豪族势力发展,将文化精英迁离地方的意图,经制度运转的长效性日益显露出来,唐代地方豪族势力在各自地域上的影响力逐渐削弱以至于消失。齐州房氏在这个大制度背景下,不可避免会衰落下去。

据《齐州房氏文化研究》(周尚兵 著)

更多世家报道请登录齐鲁晚报网(<http://www.qjwb.com.cn/>)齐鲁世家专题页面。

研究者说

齐州房氏:施政理念出自家学文化



周尚兵 山东大学

丹朱之子房陵“四十八代清雅,王莽末为清河太守,始居清河”。自房雅定居清河郡东武城(今山东武城),这一脉房氏

中人在东武城文武兼修,人才辈出,由此形成房姓人至今仍引以为傲的清河郡望,谓为“天下房氏,望出清河”。在西晋之后的动荡时局中,清河房氏的房湛于隆安四年(400年)追随南燕慕容德来到齐州济南历城定居,于是有了清河郡望的齐州房氏支系。

齐州房氏仍延续着清河房氏文武兼修的家学传统。其家学在文的方面表现在儒学、文学、史学、律学等多个领域,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房景伯、房景先、房彦询、房玄龄等,房玄龄为其中最杰出者。武的方面表现在程功节费、运筹帷幄等领域,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房法寿、房崇吉、房仁裕等,房法寿为其中最杰出

者。房氏家学的传承,一是“博综书林”,强调读书积学;二是注重实践训练,如房夷吾“又以家世能官,宗多循吏,数闻疑谏,尝经缮写。是以心闲法令,手善书刀”。房玄龄次女“博综书林”,与其家庭环境是密不可分的,因为玄龄对其子女不仅鼓励有加,而且还亲自训练其参政、文史等各种技能,“公特所钟爱,每谓亲族曰:‘我女实贤明。’尝退朝之余,时与参谋政事”。

多赖史传对房氏家学文化的摘要记录,我们尚能见到些许房氏文化的精髓。房玄龄在贞观朝任宰相时的许多措施与施政理念,我们都可以从其中找到思想源头!如“仁者之兵,义不安兴”,就是房玄

龄在处理辽东边境问题上的根本原则,正是基于这个原则,房玄龄在《伐辽高丽表》中提出了三可伐、余不可伐,从而将唐太宗伐高丽的战争处于有理、有节、有据的正义防卫范围内。再如“行大辟罪不及族,理正刑愆止于身”,就是日后房玄龄主持贞观定律所坚持的基本理念,《贞观律》“在缘坐之制方面,改旧律之兄弟缘坐处死、祖孙缘坐配流之法,为谋反大逆者祖孙、兄弟缘坐俱配没,恶方犯法者俱配流”等等,就是房玄龄本家学刑律理念而作的具体令文修改。而房玄龄之所以被称为举世贤相,乃因为房玄龄等人“使号令典刑絜然罔不完,虽数百年犹蒙其功”。